

马晓林

欧洲旅行家所记元朝宫廷节庆



图1 グラン・カンの宴会とワインの塔

Oxford, Bodreian Library, Ms. 264, f. 239r

【马晓林】1984年生，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著有《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发表中文、英文、意大利文、俄文学术论文60余篇。主要从事元史、中外关系史研究。

Ma Xiaolin is a specialist 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Eurasian Exchanges. He is the author of *Marco Polo and Yuan China: Texts, Rituals and Beliefs* (2018) and more than sixty articles. He is currently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He also serves as the vice secretary of the Yuan History Society of China.

[摘要] 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和德理在华的身份，让他们得以亲历元朝宫廷节庆并留下了详细描述，这是构建中国形象的核心文本。元朝宫廷礼仪的特点和类型，在马可·波罗《寰宇记》、和德理《行程记》中皆有反映。马可·波罗所记的两大节庆、和德理所记的四大节庆，置于元朝具体时段的历史现实背景中都可以得到解释。特定的仪式将旅行者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联系起来，为马可·波罗、和德理在中国的行迹提供了线索。在巡幸庆典、节庆中的服色与仪节等方面，中西史料的种种印证，证明了马可·波罗、和德理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中西文化交流；元代；旅行记；中世纪

在 13-14 世纪的丝绸之路上的欧洲旅行家中，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和德理（Odorico da Pordenone，又译鄂多立克，约 1280-1331）对中国的描述特别详细。马可·波罗与和德理的事迹有很多相似性。他们都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路线穿越欧亚大陆，回到意大利后都口述行程而成书。马可·波罗之书名为《寰宇记》（*Divesement du monde*），又名《马可·波罗行纪》；而和德理的《报告书》（*Relatio*），又名《行程记》、《东游录》。二书皆以抄本的形式在欧洲广泛传播。所不同的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可·波罗《寰宇记》在世俗社会流传更广，也带来了对其内容真实性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是 1995 年吴芳思（Frances Wood）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但吴芳思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国内外元史专家的赞同。学者对元朝历史考察越细致，就越能发现马可·波罗的可靠性。杨志玖先生（1915-2002）最早披露有关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文献证据，又将马可·波罗的很多记载与中国史料进行了比勘研究。何史谛（Stephen Haw）、傅汉斯（Hans Ulrich Vogel）分别在 2006 年、2012 年出版专著，从地理、环境、行政和经济等诸多方面论证了马可·波罗著作的真实性。^①至于和德理研究，目前国内所用汉译本为何高济据裕尔（Henry Yule，1820-1889）1866 年英译本转译的，^②版本陈旧且删去了裕尔的校勘记和注释，难以满足深入研究的需要。近年西方学界出版了马可·波罗、和德理的新校勘本，相关的文献学研究进展突出^③，有助于我们将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20 世纪 21 世纪之交，杨先生在两篇短文中以元代节日论证了马可·波罗记载的可靠性。^④受杨先生研究的启发，笔者对马可·波罗所记礼俗作了进一步的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13-14 世纪欧洲文献中的蒙元史料译注与研究”（20VJXG009）的阶段性成果。

初出：马晓林《欧洲旅行家所记元朝宫廷节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2022 年 5 月，第 29-38 页。

马晓林（<https://orcid.org/0000-0002-9762-1668>），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宋元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元史、中外关系史研究。

^① 杨志玖：《马可波罗与中外关系》，中华书局，2015 年。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年。Stephen G. Haw, *Marco Polo's China: A Venetian in the Realm of Kubilai Kha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Hans Ulrich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Brill, 2012.

^②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③ 参求芝蓉、安德烈欧塞：《和德理（鄂多立克）生平、〈行程记〉成书与版本流传》，《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21 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23-342 页。马晓林：《马可·波罗研究在欧洲》，《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 年第 6 期，第 67-70 页。

^④ 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他所记元代节日和刑制谈起》，《文史知识》1998 年第 9 期，收入《马可波罗与中外关系》，第 144-148 页。《马可波罗描述的忽必烈大汗》，《陋室文存》，北京：中华

研究。^①本文旨在利用欧洲文献学的最新成果，讨论马可·波罗、和德理所描述的元朝宫廷节庆，解决文本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从而评估欧洲人旅行记对于研究元史的史料价值。

一、宫廷节庆在旅行记中的重要性

要理解马可·波罗、和德理所描述的元朝宫廷节庆，必须充分考虑两方面史实。一方面，是西方旅行家在华时的身份及经历。另一方面，是元朝宫廷礼仪的时代特色。

马可·波罗、和德理抵达元朝的时间相差约半个世纪，他们的旅行记中对元朝宫廷礼仪的描述都占了不小的篇幅。1275-1291年，即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马可·波罗旅居元朝。^②蔡美彪先生已经论证，马可·波罗在元朝的身份是斡脱商人，也就是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③马可·波罗作为斡脱商人出外时，也会被委以体察风土民情的使命。这种身份使马可·波罗不仅遍行中国各地，而且出入宫廷，有亲眼目睹宫廷礼仪的机会。马可·波罗自称受到忽必烈的宠爱，留侍侧近。^④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饰，但马可·波罗对元朝宫廷的描述确实极为详尽，非亲历者不能道。

约1324-1328年，相当于泰定帝时期，和德理旅居元朝。^⑤和德理是方济各会修士，受教廷之命前往元朝传教。和德理来华以前，马可·波罗之书已经在欧洲流传。和德理启程之前，有可能读过或了解过马可·波罗之书的内容。^⑥和德理对马可·波罗的记载有不少呼应，也有很多增益，反映出视角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变迁。和德理到达元朝后，经泉州抵达汗八里（突厥-蒙古语 Qanbaliq，即元大都，今北京）。汗八里主教约翰·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已在1305年建造了一座教堂，距离皇宫极近，号称“大汗在宫里就可以听到我们歌唱的声音”^⑦。和德理应该就居于这座教堂之内。和德理作为生活圈子相对狭小的教士，接触社会不广，在返回欧洲前，他没有离开大都的迹象，如此大约有三年时间。元朝的一些宫廷礼仪，要求各教人士参加，和德理因而得以亲历。

元朝宫廷礼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古代多数王朝建立五礼制度，即吉、凶、军、宾、嘉五种类型的礼仪，于是官修正史的《礼志》一般分为五篇。但是，元朝统治者自朔漠入主中原，并没有完全采取五礼体系，而是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礼仪架构，以宣示其对广阔土地和众多族群的统治以统治阶级的特权。《元史》（成书于1370年）不设《礼志》，而是设置了《祭祀志》与《礼乐志》。正是元代国家礼仪架构之特殊，导致《元史》不得不选择这种特殊的篇章体例。《元史》之志的主要史源是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成书于1331年）。

书局，2002年，第356-364页，收入《马可波罗与中外关系》，第197-204页。

^① 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

^② Henry Yule, "Introduction", in Henry Yule and Henri Cordier,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3rd edi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vol. I, p. 21. A. C. Moule and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Vol.1, 1938, pp. 26-27.

^③ 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177-188页。

^④ Sharon Kinoshita trans.,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Hackett, 2016, p. 11.

^⑤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London: Hakluyt, 1866, pp. 132-133.

^⑥ Alvise Andreose, *Libro delle nuove e strane e meravigliose cose. Volgarizzamento italiano del secolo XIV dell'itinerarium di Odorico da Pordenone*, Padova, 2000, pp. 18-19.

^⑦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63-268页。

《经世大典·礼典》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大致属于节庆范畴，中篇大致属于祭祀范畴，下篇为佛道。《元史》之《祭祀志》正是祭祀范畴，《礼乐志》中的礼仪属于节庆范畴。因此，元代国家礼仪可分为祭祀、节庆两大类型。

马可·波罗、和德理对元朝祭祀的记载是很稀少的，这与元朝祭祀的特点有关。元朝的祭祀是由蒙古、汉二元传统构成的。汉式的郊、庙、社稷等祭祀，世祖、泰定帝皆未曾亲临，基督教士更不参加。元大都的蒙古礼仪，以烧饭祭祀为代表，只有少数蒙古贵族才能参加。马可·波罗、和德理没有记载元大都的祭祀仪式，应该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些仪式。和德理没有去过上都的迹象，没有记载元上都的任何礼仪活动。但马可·波罗记载了元上都的洒马奶祭祀。洒马奶（蒙古语 *saculi*），用以祭祀长生天（蒙古语 *Möngke Tengri*），是元朝最尊贵的祭祀。^①自世祖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起，元朝皇帝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地区驻蹕约五个月，在夏末秋初都要进行洒马奶祭天仪式。马可·波罗记述的种种细节，^②与《元史·祭祀志》《析津志》等汉文史料若合符契。^③而且检诸汉文史料，马可·波罗所记日期只与1276年吻合，因此可以推测当时马可·波罗大概在上都。^④这与马可·波罗在华的行程是相符的。洒马奶祭祀，伴随着宴会活动，有一定的节庆性质，所以马可·波罗得以目睹。马可·波罗、和德理作为西方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教士，能够见到的元朝宫廷礼仪主要是节庆。因此，宫廷节庆成为这一时代西方旅行家构建中国形象的核心文本，在旅行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二、马可·波罗所记两大节庆

至于元朝的宫廷节庆，马可·波罗提到了两大节庆，一是新年，一是大汗的生日。^⑤汉文资料有助于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

据《元史·礼乐志》记载，元朝共有十种礼节，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三种：（1）元正受朝仪；（2）天寿圣节受朝仪；（3）郊庙礼成受贺仪。^⑥这三个场合行用元朝最高级别的礼仪。第二组仪式与第一组类似，仅稍加变化，包括七种：（1）皇帝即位；（2）上尊号；（3）册立皇后；（4）册立皇太子；（5）太皇太后上尊号；（6）皇太后上尊号；（7）太皇太后加尊号。^⑦

在上述二组十种礼仪中，元正受朝仪、天寿圣节受朝仪分别始行于至元八年（1271）、九年（1272），从此每年都举行。这恰与马可·波罗所记的新年、大汗生日相符。而其他八

^① 马晓林：《元代蒙古人的祭天仪式》，《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第84-91页。

^② A. C. Moule and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Vol.1, 1938, pp. 187-188.

^③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郊祀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81页。《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1页。

^④ 马晓林：《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第63-73页。

^⑤ Sharon Kinoshita trans.,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 78. A. C. Moule &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vol. 1, p. 221.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高田英樹译：《世界の記——〈東方見聞録〉對校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年，第208-209页。

^⑥ 《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6-1669页。

^⑦ 《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9-1683页。

种礼仪都是在特定情况下才举行。马可·波罗从 1275 年到 1291 年居留中国，是否有机会见到其他八种礼仪呢？

忽必烈在位期间，至元十年（1273）三月，册立皇后、皇太子。^①马可·波罗彼时尚未抵达，不可能看到册立皇后、皇太子这两种礼仪。还有五种礼仪是马可·波罗离华以后元朝才创制的。皇帝即位仪式，始行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铁穆耳登基之时；皇太后上尊号，始行于武宗至大三年（1310）十月；太皇太后上尊号，始行于英宗延祐七年（1320）三月；太皇太后加尊号，惟行于英宗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郊庙礼成受贺仪，始行于文宗至顺元年（1330）十二月。^②总之，上述七种礼仪，马可·波罗皆无缘得见。

至元二十一年（1284）初，忽必烈在大都举行了元朝首次上尊号礼仪，^③规模盛大。马可·波罗对此完全没有记载，大概表明他彼时不在元大都。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轨迹，陈得芝先生研究指出，马可·波罗在 1280-1281 年间出使云南，然后短暂回到大都，随后 1282-1287 年间在扬州和杭州居住。^④傅汉斯通过研究马可·波罗所记杭州税收数目，认为马可·波罗可能在 1285-1287 年期间居住在杭州。^⑤从节庆角度得出的推论，与他们的观点相合。马可·波罗没有见到 1284 年忽必烈在大都上尊号的仪式，因为他已经离开大都前往扬州。

三、和德理所记四大节庆

和德理来华时，距离马可·波罗约有半个世纪，世易时移，节庆也有变化。和德理提到元朝有四大节庆。这需要结合他在华时元朝的历史背景来考证。

和德理的行程尽管还有一些不能确定的细节，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他大概在 1323 或 1324 年从广州登陆，然后在 1325 年左右到达大都，停留三年之后，约 1328 年离开大都，由陆路穿过中亚返回欧洲。^⑥因此，和德理所见的应是泰定帝也孙铁木儿（Yesün Temür, 1323-1328 年在位）的宫廷盛宴。

泰定帝 1323 年即位于漠北（和德理应该没有到过其地）。五年后，1328 年农历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去世，两都之间为争夺皇位爆发了内战。战争从 1328 年下半年开始，蔓延到 1329 年初。泰定帝之子天顺帝在战争中下落不明。获胜者元文宗图帖睦尔于 1328 年十月在大都即位，但在 1329 年 2 月退位，将权力交给了皇兄元明宗和世刺。九月，和世刺被毒死，图帖睦尔在上都再次登基。和德理没有提及泰定帝之死、两都之战，遑论文宗、明宗之

^① 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卷一《诏令·立后建储诏》，天津：北京：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 年，第 8-9 页。

^② 《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第 381 页；卷二三《武宗纪二》，第 527 页；卷二七《英宗纪一》，第 600、608 页；卷一一八《特薛禅传》，第 2919 页；卷三四《文宗纪三》，第 770 页。

^③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第 263 页。

^④ 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0 期，1986 年，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30-447 页。

^⑤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pp. 289, 377.

^⑥ Andrea Tiliatti, “Odorico da Pordenone”,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vol. 79 (2013); 李世佳 (Vladimír Liščák): 《鄂多立克东游录》与元代中国》，《世界汉学》第 13 辑，2014 年，第 51-55 页。

间的生死纠葛。原因可能是和德理在泰定帝驾崩之前已经离开中国。

和德理记载,大汗每年有四次节庆。早期拉丁语抄本记载这些节庆“具体包括割礼节庆、大汗的生日,以及其他”(scilicet festum circumcissionis, eiusque nativatis diem, et sic de reliquis),^①实际上只记载了两个名目。而1574年刺木学刊布的意大利语版本(学界通称小刺木学本“Ramusio minor”)中如此记载大汗每年的四节庆:“首先是他的生日,其次是他的加冕日,第三是他与皇后结婚之日,第四是他的长子的生日”(la prima è per il dì della sua natività, la seconda è dell'incoronazione sua, la terza è del matrimonio, quando menò per moglie la regina, la quarta è della natività del suo primogenito fi gliuolo)。^②

割礼在这里是很奇怪的,因为世界上只有犹太人、穆斯林以及非洲部分民族行割礼,蒙古人从来就没有这种风俗。在小刺木学本中, circumcissionis(割礼)一词被改成了 incoronazione(加冕)。^③这可能是由于传抄者或整理者认为蒙古人不可能行割礼。这样一改,乍一看似乎更合理,但实际上背离了和德理的本意。和德理在元朝期间,处于泰定帝统治时期,不可能有皇帝加冕即位的仪式。实际上,和德理此处所谓割礼,特指耶稣割礼节,即1月1日。^④当时如和德理这样的方济各会修士,习以基督教节日代替历日。如13世纪中期到访蒙古高原的方济各会修士威廉·鲁布鲁克全书皆不用某月某日,而代之以某基督教节日前后第几天。因此,和德理实际上是用耶稣割礼节代指元旦节庆。

泰定帝的生日是十月二十九日,那一天他通常在大都。和德理在大都三年,大概连续三年参加了元旦节庆、大汗诞辰节庆。

和德理所记的第三、四个节庆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小刺木学本所记的皇帝与皇后结婚之日、皇长子的生日,关乎皇后和皇长子,让人想起泰定元年(1324)三月举行的册立皇后、册立皇太子的仪式。^⑤然而,册立仪式不是每年都举行的,而且1324年初和德理不可能抵达大都。古代东亚不曾有结婚周年纪念日这样的节庆。与皇后相关的每年都举行的节庆只有一种可能,即皇后诞辰。蒙古人起初没有庆祝生日的习俗,13世纪中叶蒙古宫廷才开始庆贺皇帝诞辰。^⑥至于庆祝皇后诞辰,直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才出现。^⑦而和德理已去世二十余年,不可能获知其事。元朝庆祝皇太子诞辰始于至大元年(1308)。从这一年开始,高丽国王每年遣使入元祝贺。^⑧《秘书监志》中保存了泰定二年(1325)秘书监呈献的贺皇

^① Odorico da Pordenone, *Relatio de mirabilibus orientalium Tatarorum*, ed. by A. Marchisio, Firenze: Sismel-Edizioni del Galluzzo, 2016, p. 208 (XXIX 1).

^②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Navigazioni e viaggi*, ed. by M. Milanese, vol. IV, Einaudi, Torino, 1983, p. 317;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 pp. 141, note 2.

^③ Alvisse Andreose and Philippe Ménard, *Le Voyage en Asie d'Odoric de Pordenone: traduit par Jean le Long OSB - Itinéraire de la pèlerinage et du voyage (1351)*, Paris: Droz, 2010, pp. 53-54, 202.

^④ Antonio De Biasio, *Odorico da Pordenone in Cina. Rilettura dei capitoli cinesi della Relatio*,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13, p. 171.

^⑤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第645页。

^⑥ 参马晓林:《马可·波罗、鄂多立克所记元朝天寿圣节》,《杨志玖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09-424页。

^⑦ 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八,重庆、北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91页。

^⑧ 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二,第1042页。

太子千秋（诞辰）筵。^①泰定时期，应该每年都庆祝皇太子诞辰。小刺木学本所载第四个节庆皇长子的生日，与和德理在元朝时的情况相合。尽管第四个节庆名目恰好符合事实，但小刺木学本的第三个节庆名目是无法找到实据的。

考虑到小刺木学本的后两个名目很可能是后人传抄时妄自增补的，可靠性不高，我们可以将它们放在一边，只考虑“四”这个数。元大都的方志《析津志》有专记岁时节庆的篇章。

《元史》所载的即位、诞辰等属于庄重典雅的“礼”，而《析津志》所记节庆更侧重“俗”。在《析津志》中，我们能发现元朝每年举行“大茶饭”即宫廷大宴还有两个场合：一是二月“游皇城”时，二是皇帝巡幸时。^②如泰定元年（1324）二月就举办了游皇城。^③游皇城虽然号称“佛事”，其实是一种都市庆典，倡优百戏、各宗教都可能参加。泰定时期几乎每年二月都有“佛事”，可能都意味着有游皇城庆典。皇帝每年巡幸两都，都有一系列庆典，详见下文。

综上所述，和德理所记四大节庆，前两个应是元旦、大汗生日，与马可·波罗所记相同；后两个名目，和德理没有明记，我们推测皇太子生日、游皇城、皇帝巡幸时的庆典都是备选项。和德理之所以不记这两个名目，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其书系病中口述，成书仓促。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名目对于欧洲人而言较为陌生，解释起来较为复杂，那么和德理本人或其笔录者很可能将之略去不述。

四、巡幸的庆典

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度。皇帝每年在大都、上都之间往还。不仅如此，元朝皇帝每年还在两都附近举行春猎秋猕。^④皇帝出行时，后妃诸王随行，百官扈从，旌旗蔽日，如云之盛。皇帝从上都或者春猎之地回到大都时，都有迎驾礼仪，实际上相当于节庆活动，只是具体日期不固定。

关于巡幸的仪仗，和德理记载：“他有四支骑兵，一支在他前面先行一日程，两翼各一支，另一支殿后一日程，所以他可说是始终走在十字的中心”。^⑤《元史》载，文宗时枢密院臣言：“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⑥这与和德理在华的时间很接近。元人傅与砺（1303-1342）《驾发》诗有云：“千官剑佩屯云合，五卫旌旗拥日低。”^⑦五卫，职掌宿卫扈从，分为左、右、中、前、后。^⑧这与和德理记载的队列布局是相合的。和德理记载，大汗乘坐二轮辇，用四象、四马牵引。很多史料都印证元朝皇帝喜乘象舆。象舆又称象轿、象辇。马可·波罗

^① 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8-149页。

^② 《析津志辑佚》，第214-216、222-223页。

^③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第644页。

^④ 李治安：《元朝诸帝“飞放”围猎与昔宝赤、贵赤执役考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第28-36页。

^⑤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83页。

^⑥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第768页。

^⑦ 傅与砺著，杨匡和校注：《傅与砺诗集校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4-195页。

^⑧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57-2161页。

也记载，象舆由四头大象驮着。^①元末张昱《辇下曲》有诗云：“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驮着殿行。”^②和德理又记，大可汗有侍卫四人，称为怯薛，左右执御，奉驾而行。侍卫，何高济汉译本据裕尔英译本作 Cuthe，^③エラー！参照元が見つかりません。实际上诸抄本写形各异，有 Cuche、Cushe、Zuche 等，正确的写形应为 Cuche，对应蒙古语 keshig（元代音译“怯薛”）。

马可·波罗记载，大汗忽必烈每年阳历三月初从都城南下，行二日程，至海子，在那里举行春猎。^④冯承钧将海子译为海洋，遂认为马可·波罗意有未达，因为北京至海洋的距离远超过二日程。^⑤实际上，元人惯以海子指湖泊。蒙古语 na'ur（湖泊），在《元朝秘史》中皆译为“海子”，^⑥14 世纪初伊本·木罕纳也将之译为“海”。^⑦马可·波罗此处用 mer Hosiane 一词，^⑧指的是元朝皇帝春猎之地溲州（今北京通州）柳林的湖泊，所以应译为海子。溲州柳林春猎是元朝历代皇帝必循之例。元武宗在溲州泽中筑“呼鹰台”，英宗建行殿于柳林。^⑨呼鹰台，显然与鹰猎有关，后世称为晾鹰台，是清代溲县八景之一，^⑩遗址至今犹存。^⑪柳林春猎持续一个月有余，随后皇帝回到大都时，有迎驾、朝会等庆典。元人虞集记载，一次，“上（世祖）自校猎还宫，伶人道迎，有被色缛缀杂旄象狮子以为戏者，载舆象见之惊逸，执舆者莫能制。”^⑫这说明迎驾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伎乐表演。这次有舞狮表演，不意导致世祖乘坐的大象受惊奔走。至于宴会，马可·波罗记载：“当他（大汗）抵达他的首都汗八里时，便在其主要宫殿驻跸恰好三天。他召开了隆重的朝会，维持极为可观的人数。在他妻子们的陪伴下，他大肆享乐、庆祝。”^⑬据汉文史料所记元朝皇帝的行程，确实是返回大都停留三天后启程赴上都。^⑭三天之期，与马可·波罗所记相合，可知马可·波罗所记朝会当非虚言。

皇帝每年秋从上都返回大都的前后，大都也举行一系列庆典活动。首先，皇帝从上都启程之时，留守大都的百官得到消息，便举行“巡城会”。《析津志》记载：“省院台官大聚会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 298 页。

^② 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四部丛刊本，第 13a 页。

^③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 83 页。

^④ Sharon Kinoshita trans.,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 82.

^⑤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 230-232 页。

^⑥ 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6、125、158、207 页。

^⑦ 宝朝鲁编：《汉译简编穆卡迪马特蒙古语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49 页。

^⑧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 Il Manoscritto della Biblioteca Nazionale de France Fr. 1116*, Vol. 1, ed. Mario Eusebi, Venice: Edizioni Ca'Foscari, 2018, p. 113.

^⑨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第 500 页；卷二七《英宗纪一》，第 610 页；卷二八《英宗纪二》，第 619 页。

^⑩ 光绪《通州志》卷一《封域·古迹》，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年，第 50a、54b 页。

^⑪ 参陈晓伟：《释“答兰不刺”》，《历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85-188 页。

^⑫ 虞集：《贺忠贞公墓志铭》，《道园类稿》卷四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350 页。

^⑬ Sharon Kinoshita trans.,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 78. A. C. Moule &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vol. 1, p. 221. 笔者汉译。另参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 222 页；高田英樹译：《世界の記——〈東方見聞録〉對校譯》，第 208-209 页。

^⑭ 参渡边健哉：《元大都形成史の研究：首都北京の原型》，仙台：东北大学出版会，2017 年，第 289-301 页。

于健德门城上。分东西两班，至丽正门聚会，设大茶饭。谓之巡城会。”^①其次，巡幸仪仗抵达大都以北时，诸王、百官、卫军、留守怯薛依次前来迎驾，“若翰苑泊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恭迎大驾入城。”^②和德理讲述了一段他面见大汗的轶事。有一次，当大汗从上都到汗八里（大都）时，他和另四个小级僧侣，坐在汗要经过的路旁树下。大汗经过时，被他们唱诗的声音吸引。大汗问身边的人，四位诸王回答说，这是四位法兰克列班（Rabban，是对教士的尊称）。大汗召见了他们，他们献上一盘苹果为礼。^③献苹果为礼，符合宗教语境，因为方济各会以苦修著称，不蓄资财，没有准备贵重的礼物。和德理等教士当时正是在迎驾时用基督教的礼仪唱诗祝献。前引汉文史料所载“翰苑泊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与和德理的轶事若合符契。

五、节庆中的服色与仪节

元朝的朝会礼仪是在世祖至元八年（1272）仿中原传统并结合蒙古礼俗制成的。马可·波罗 1275 年来华，是最早亲眼目睹元代朝会的西方人之一。他详细描述了新年、皇帝生日时宫廷的节庆礼仪。几十年后和德理的记载也颇为详细，与马可·波罗互相补充，而且契合汉文史料。

马可·波罗提到了朝会的班次，皇族在前，然后是诸国王、官人们（barons，直译男爵们），其后为其他诸人，各按次第就位。^④和德理提供了更多信息，他记载，官人们头戴冠，手执白色象牙牌，官人们按照等级穿着三种不同颜色的衣服：第一种是“绿色”（de viride），第二种是“血红色”（de sanguineo），第三种是“藏红花色”（de croceo）。^⑤官员手执的白色象牙牌，显然就是元代朝仪中必备的“笏”。^⑥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第三种服色“藏红花色”。藏红花（又名番红花，英文名 saffron，拉丁文学名 *Crocus sativus* L.）的花瓣是紫色的；而花蕊常被用作香料、染料，水溶液呈黄色。^⑦和德理此处所取的当是紫色之意。按元制，一品到五品官员服紫，六、七品服绯，八、九品服绿。^⑧元代刊行的居家日用百科全书《事林广记》收录了一幅“皇元朝仪之图”，相当于朝会礼仪的指导手册。^⑨在朝会图中，百官按照制度规定从高到低穿着紫、绯、绿三种服色。和德理所记述的朝会中的绿色、血红色、藏红花色（紫色）服色，是按品级从低到高的顺序。14 世纪的欧洲传抄者不能理解和德理“藏红花色”的本意，理解为了黄色，甚至画蛇添足地添了一句短语解释：“藏红花色即黄色”（de

① 《析津志辑佚》，第 205 页。

② 《析津志辑佚》，第 222 页。

③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 95-96 页。

④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 224 页。

⑤ Odorico da Pordenone, *Relatio de mirabilibus orientalium Tatarorum*, pp. 208, 314.

⑥ 《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元正受朝仪》，第 1667-1668 页。

⑦ 参杨建军：《染料红花古名辨析兼及番红花名称考》，《丝绸》2017 第 2 期，第 73-81 页。

⑧ 《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服色·文武品从服带》，第 1110 页。

⑨ 松田孝一：《『事林广记』「皇元朝仪之图」解说》，《13、14 世纪东アジア诸言語史料の総合的研究：元朝史料学の構築のために》，森田憲司编《平成 16 年度-18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B）研究成果報告書》，2007 年，第 36-62 页。松田孝一《『事林广记』「皇元朝仪之图」解说補遺》，《13、14 世纪东アジア史料通信》9（2009），第 1-8 页。

croceo idest çano)。^①1351年法语抄本径作 *gaune*（黄色，相当于现代法语 *jaune*）。何高济也据裕尔英译本的理解译为“黄”。^②而意大利北部方言“黄色”（*çano*）与“白色、灰白色”（*cano*）写形相似，导致了当时人的进一步误解。1929年万嘉德（A. van den Wyngaert）的拉丁文校本作“灰色或灰白色”（*glauco sive cano*）。^③高田英树译为“青灰色或灰色”。^④笔者认为“黄色”、“灰白色”、“灰色”都是传抄中出现的衍讹，只有“藏红花色”才是和德理的原文。这符合西方校勘学“疑文从难”的规律。和德理的绿色、血红色、藏红花色（紫色），与元朝服色制度相符。

马可·波罗没有记载官员的三等服色，但详尽记载了一色质孙服之制。三等服色源自汉制，而蒙古本俗则有一色质孙服之制。元代朝会是糅合了汉制与蒙古礼俗的复合型礼仪。朝会与宴飧前后相连，密不可分。深谙元朝典制的元人王恽（1227-1304）记载：“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飧，三者而已。”^⑤正是因为与朝会相结合，宴飧才成为元朝三大事之一。至元八年（1272）入元的高丽使臣记载，朝贺礼仪结束之后要举行宴会，群臣“改以戎服上殿”。^⑥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元史》记载，“（朝仪）礼毕，大会诸王宗亲、驸马、大臣，宴飧殿上，侍仪使引丞相等升殿侍宴。……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⑦从高丽使臣的记载可知，元朝君臣在朝贺礼仪中穿着汉式服色，朝会结束后更换为蒙古袍服，开始宴会。质孙，一般认为系音译自蒙古语 *jisün*（颜色），叶奕良先生认为来自波斯语 *jashn*（节庆，礼仪）。^⑧《元史》记载：“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⑨马可·波罗有详细的记载：

其诞日，大可汗穿着金锦制成的高贵之衣。足有一万二千人的贵族与骑士，穿着与大可汗同色同款之衣；虽不同等贵重，但颜色相同，以丝、金之布料制成，每人都有很大的金腰带。大可汗赐予他们这些袍服。我还要告诉你们，有一些袍服上饰以珍贵的宝石和珍珠，价值超过一千金币，这样的袍服有很多。要知道大可汗每年十三次赐富贵之袍服给这一万二千贵族与骑士。他让他们全体穿着与自己类似的衣服，价值高昂。^⑩

^① Odorico da Pordenone, *Relatio de mirabilibus orientalium Tatarorum*, p. 314.

^②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 87 页。

^③ B. Odoricus de Portu Naonis, “Relatio,” A. van den Wyngaert O.F.M.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 1, Quaracchi - Firenze, 1929, pp. 413-495, p. 480 [XXIX 2].

^④ 高田英树：《原典中世ヨーロッパ東方記》，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年，第 639 页。

^⑤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 166 页。

^⑥ 李承休：《动安居士集·动安居士行录》卷四《宾王录》，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高丽名贤集》第 1 册，1986 年，第 617-626 页。

^⑦ 《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元正受朝仪》，第 1669 页。

^⑧ 叶奕良：《关于〈元史〉中“质孙服”等的探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编《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359-367 页。

^⑨ 《元史》卷七八《輿服志一》，第 1938 页。

^⑩ Sharon Kinoshita trans.,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p. 78. A. C. Moule &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vol. 1, p. 221. 笔者汉译，参考了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马可·波罗学术项目”读书班包晓悦、寇博辰初译，集体讨论的文本。另参考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 222 页；高田英树译：《世界の記——〈東方見聞録〉對校譯》，第 208-209 页。

王恽曾上奏：“国朝服色尚白。今后合无令百司品官，如遇天寿节及圆坐厅事公会、迎拜宣诏，所衣裘服，一色皓白为正服。”^①按蒙古习俗，白色最尊。王恽提议，在重大节庆、重要公务场合，官员统一以白色为正服。但这一提议没有被采纳。元代质孙服实际上不止白色。元朝的舆服制度规定，天子质孙，冬之服十一等，夏之服十五等；百官质孙，冬之服九等，夏之服十四等。各等的差别主要在于颜色和材质，最常用的布料是纳石失（nasij），即“金锦”。^②这是来自西域的一种织物。^③马可·波罗说怯薛们的袍服“以丝、金之布料制成”，这种布料就是以织入金线的织物纳石失。

在朝会期间，臣子向皇帝进献礼物。马可·波罗称，在新年、大汗生日那天，所有省份和地区都进献宝物，还进献为数众多的白马、骆驼。和德理也记载了进献礼物的场景：

随后待命的是备好白马的亲族。然后另一个声音喊道：“某亲族中的某人，向君主献上若干百匹马。”在那随即另有人待命，带着准备好的两百匹马到君王面前，他们献给大汗白马之多，令人难以置信。随后进献礼物的是男爵们，代表其他男爵们。所有寺院长老也带着礼物来到他这，指定为他祈福。我们也需要这样做。^④

1351年，法国修士让·勒隆（Jean Le Long）将和德理之书从拉丁语译为法语。这距离其书最初成稿不过二十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世纪拉丁原文的意思。具体到上述段落，法语本文意与拉丁语本基本上是一致的，^⑤但法语本所使用的专有名词，尤有参考价值。如拉丁本所记皇室家族（parentela），法语本作 sanc royal，显然指的是元朝皇室。男爵们（baroni）是欧洲中世纪常用的对贵人、官长的泛称，这里对应的是元朝各级官署长贰。法语本解释男爵们代表了 Seigneur selonc leur estat，虽然有各国君主的意思，但这里理解为各级官署长官更合适。寺院长老（monasteri principales）当然指的是各宗教领袖。《元史》记载，首先是后妃、诸王、驸马，其次是丞相进读各级官署表章礼物目，最后是佛道、耆老、外国蕃客。^⑥这与和德理的记载可以算是逐一对应的。

在礼仪执事人员方面，马可·波罗、和德理都记载有专人负责高声呼喊，指挥鞠躬行礼等仪节。^⑦这就是元朝朝仪制度中负责“唱”、“赞”的礼官。^⑧和德理还记载，有一些官员负责监督男爵是否缺席，缺席者要受到严格的惩罚。^⑨元代确实设立了两种专门负责监礼的官员。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颁布圣旨，规定札撒孙、监察御史负责在朝会时整治礼仪秩序，

^①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六《论服色尚白事状》，第421页。

^②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第1938页。

^③ Thomas T. Allsen, *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Odorico da Pordenone, *Relatio de mirabilibus orientalium Tatarorum*, pp. 210-211. 原文为拉丁文，笔者汉译。参14世纪托斯卡纳语抄本：*Libro delle nuove e strane e meravigliose cose. Volgare italiano del secolo XIV dell'Itinerarium di Odorico da Pordenone*, ed. by A. Andreose, Padova: Centro Studi Antoniani, 2000, p. 171.

^⑤ Alvise Andreose and Philippe Ménard, *Le Voyage en Asie d'Odoric de Pordenone*, pp. 54-55.

^⑥ 《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6-1669页。

^⑦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87页。

^⑧ 《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第1666-1669页。

^⑨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87页。

纠察失仪者，处以罚钞、标附的惩处方式。^①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始设于世祖朝前期，自世祖朝后期以后参用汉人、蒙古人。^②札撒孙是蒙古职官，又称札撒兀孙、扎散温孙，音译自蒙古语 *jasaqulsun*，义为执法者，据汉文、波斯文史料可知，其基本职能是为斡耳朵、军队及个人指定平时驻营、战时布阵和大聚会时的位置，元代演化为维持宫廷秩序。^③马可·波罗、和德理虽然没有记载这些官名，但准确地记录了他们的职能。

结论

元朝的宫廷节庆，本质上由朝会与宴飨组成，在游牧民族风俗的源头上，大幅借鉴中原礼制，融合发展而成。《马可·波罗行纪》贴切地反映了元朝的祭祀和节庆两大类仪式。马可·波罗记载了每年两场节庆，分别对应新年（元正）和皇帝的生日（天寿圣节），在汉文资料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而和德理所记的四大节日，在 1320 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也是可以大致得解。实际上，从元世祖时期开始，元朝每年的节庆数量在不断增加。和德理所记的第三、第四个节日的所指，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皇太子生日、游皇城、皇帝巡幸时的庆典都是备选项。

元朝的一些重要仪式只在特定场合举行。将特定的仪式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就能将旅行者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马可·波罗很可能在 1276 年 7 月 28 日举行洒马奶仪式时在上都；而在 1284 年初元世祖上尊号时，马可·波罗并不在大都。而和德理在大都时所见的节庆，与泰定时期（1324-1328）的历史现实也是相符的。在这期间，在泰定帝某次从上都返回大都时，和德理等人前往大都以北迎驾，得到了召见。

马可·波罗、和德理所记元朝节庆的诸多细节，得到了各种汉文史料的证实。这证明他们的旅行记是真实可靠的。不能因为文本中出现了今人感觉陌生的内容，就将其判定为谎言。实际上，许多暂时未解决的问题，在坚实的语言学考证和历史学背景之下可以得到解释。全面引入西方文献学界的校勘整理成果，对研究的深化必然大有助益。

从马可·波罗、和德理的记载，可以注意到 13-14 世纪西方旅行家对元朝礼仪的态度是友善的、正面的甚至是赞赏的。可以说，元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实力，足以使其文化成为西方倾慕的对象。随着元朝灭亡后中西交通不再畅通，他们的旅行记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仍在积极地传播来自元朝的中国形象。

^① 《至正条格·断例》卷三《职制·失仪》，首尔：Humanist 出版社，2007 年，第 189 页。

^②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 2178-2179 页。

The Yuan Court Festivals Recorded by European Travelers

Ma Xiaolin

(School of History &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Song-Yuan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Among European travelers on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Marco Polo (1254-1324) and Odorico da Pordenone (ca. 1280-1331) provided particularly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China.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se materials has been noted both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Drawing on the new phil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European academia on the studies of original texts in Latin, Italian, and French helps transcend the limits of using second-hand translations by previous scholars. Meanwhil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by making reference to their recent translation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promote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Yuan China and Sino-foreign relations. The considerable accounts of the Yuan imperial festivals by Marco Polo's *Devisement dou Monde* and Odorico's *Relatio*, constitute the core texts for contemporary travelers to construct the image of China.

The two festivals recorded by Marco Polo and the four festivals recorded by Odorico da Pordenone can all be explain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ical realities in the two specific phases of the Yuan Dynasty. Marco Polo mentioned two festivals, one for the New Year and the other for the birthday of the Great Khan. Among the ten rituals recorded in the *Yuanshi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first two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counts of Marco Polo. At the beginning of 1284, Qubilai held another ceremony in Dadu, but Marco Polo did not mention it, which confirms the fact that he had left Dadu for Yangzhou at that time. The other seven rituals were never held during Marco Polo's stay in China. Among the four festivals recorded by Odorico da Pordenone, the first two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Marco Polo, and for the other two unnamed by Odorico,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ding (1324-1328), the options could be the crown prince's birthday, the parade in the imperial city, or the welcoming ceremon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imperial parade returning to Dadu.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imperial parades between the two capitals and imperial hunting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were institutionally implemented. The welcoming ceremonies when the imperial parade returned to Dadu each year actually became a festival. The details of the imperial guards, itinerary, and etiquette described by Marco Polo and Odorico da Pordenone are all confirmed by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Odorico da Pordenone's recounting of the anecdote that he and the Franciscans met the Great Khan took place right in the welcoming ceremony when the emperor arrived in Dadu from Shangdu.

After textual criticism, Odorico's three-color costumes (*de viride, de sanguineo, de croceo*) in the court festival are in line with the green, scarlet and purple official costumes of the Yuan Dynasty.

Marco Polo and Odorico also provided rich and credible details on the court banquet, the procedure for courtiers to present gifts, and the ceremonial deacons, etc.

Corroboration of various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can prove the authentic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left by Marco Polo and Odorico. Many previously unresolved issue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solid evidence of linguistic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 specific ceremony can associate a traveler with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which provides clues for Marco Polo and Odorico's trackway in China. The travelogues of Marco Polo and Odorico da Pordenone actively promoted the images of Yuan China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Key words: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the Yuan Dynasty; travelogue; medieval.